

美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

A Stud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ies in America

◆ 许 嘉 等著

时事出版社

美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

A Stud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ies in America

◆ 许 嘉 等著

时事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美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许嘉等著. —北京: 时事出版社, 2008. 4
ISBN 978-7-80232-077-2

I. 美… II. 许… III. 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美国 IV. D8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18203 号

出版发行: 时事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万寿寺甲 2 号

邮 编: 100081

发行热线: (010) 88547590 88547591

读者服务部: (010) 88547595

传 真: (010) 68418647

电子邮箱: shishishe@sina.com

网 址: www.shishishe.com

印 刷: 北京百善印刷厂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50 字数: 850 千字

2008 年 4 月第 1 版 200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98.00 元

谨以此书献给国际关系理论的探索者们

序

近年来，研究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在我国已蔚然成风，并取得了显著成就。我国学者之所以对研究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产生如此浓厚的兴趣，主要由于他们对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建设与发展具有借鉴和促进意义。具体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论述：

（一）学会猜想与反驳

国际关系研究目前是社会科学领域中最活跃的学科领域之一，^①这与该领域中不断出现的理论创新有关。这种创新的外在表现，是具有科学精神的知识分子对原有理论的不断猜想和反驳，内在驱动便是从柏拉图时代流传下来的西方学术界的批判性思维传统。猜想是科学创新的动力，反驳是科学创新的前提。人类知识的进步正是靠着对既有理论的不断怀疑、挑战与超越来实现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界不存在任何权威理论，也不存在永恒的理论，即“真理”理论。正如肯尼思·沃尔兹（Kenneth Waltz）所说，“规律常在，理论有生有灭”，“理论不对事实做最终解释；我们永远不能肯定一个好的理论不会被另一个好的理论所代替”。^②

① 2007年底我在法国访问时发现，国际关系研究在法国军队受到极大重视。在法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之下法军设有5大具有指导功能的职能部门，其中之一就有国际关系部。在我国，国际关系研究被作为通用学科，在军内重视程度较国外要弱一些。

② [美] 肯尼思·沃尔兹：《国际政治理论》（胡少华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7、11页。

了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史的人都知道，它是一部猜想和反驳的历史。^①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界出现的每一种“时代”理论（theory of that time），即在某一段时期内占主导地位的理论，都是以被批判的同时被学习的方式影响那个时代理论界的。由此出现了一种违反初衷的怪圈，理论的影响力与它的批判对手之间存在着一种依赖关系：理论的批判对手愈强，其影响力愈大，反之则愈小；理论的批判对手越多，它被学习的可能性越大，反之则越小。理论是否能站稳脚跟并取得主导地位，不在于不被批判或反驳，而在于在批判或反驳中不被批驳倒。因此，每一个理论家在推出自己的理论后都希望有人会对它反驳和质疑；而每一种希望成功的理论家最初要被人们所认识大都要从对现有权威理论的挑战开始。在这种猜想和反驳的背后，我们可以看到西方国际关系学者的两点精神：

第一，怀疑权威的批判精神。著名政治学者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在论述思想进步的动力时曾经说过，“知识进步的方式，特别是我们科学进步的方式，是以预期原有科学的不正确性，通过猜测、通过对我们的问题做出尝试性的结论，通过猜想的方式来实现的。这些猜想被批判主义所控制，这就是说，被反驳努力所控制。它包括一些关键的检验……。一种理论反驳，尝试对我们问题做出严肃结论的反驳永远是使我们接近真理向前迈进

① 20世纪30年代，当盛极一时的理想主义越来越不能解释二战爆发前的国际关系现象时，E. H. 卡尔首先向理想主义发出了质疑和挑战。二战后，汉斯·摩根索第一次系统地阐释了传统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并建立了完善的现实主义理论体系。然而，从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起，摩根索的传统现实主义先后经历了科学行为主义和自己阵营内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挑战和批判。行为主义对传统现实主义的质疑是在具体方法上的；新现实主义对传统现实主义的质疑是在思维方式上的。有趣的是，新现实主义的挑战并没有引来多少传统现实主义者的回应，却刺激了具有理想主义传统的新自由主义的发难，由此引发了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界长达20多年之久的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论战。在这场论战中西方新马克思主义者也站在了现实主义的对立面，提出了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和世界体系理论。新自由主义与新现实主义的论战不仅给许多学者以很大的启发，同时也让他们开始对原有主流理论开始提出质疑。在这样的背景下，建构主义者提出了文化体系决定身份认同和国家利益的观点，从而对以客观物质世界解释国际关系的原有主流理论提出了挑战。

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国际关系理论争论，无论理论学派之间有多大的分歧，它们在一点上是共同的，即它们的研究基础都是立足于客观世界来理解主体性的。而80年代以后，特别是冷战结束后出现的各种反思理论，其研究的基础大都是立足于意识论来理解主体性的。这些理论都是从本体论出发，对主流理论提出挑战、质疑和批判。在这些非主流理论中，代表性的理论有：批判理论、后现代主义和规范理论。在猜想和反驳的理论辩论过程中，建构主义理论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界属于骑墙派，是一种走中间道路的理论，它的既非唯物主义，又非唯心主义的理论思辨一方面提醒人们在国际关系研究中对主观能动的关注；另一方面又让人们在阅读它的时候常常怀疑其理论根基的可靠性。

的一步。这就叫我们怎样从错误中学习……。”^① 恩格斯曾经说过：“今天被认为似乎是合乎真理的认识都有它隐蔽着的、以后会暴露出来的错误的方面。”^② 中国学者在研究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时，对西方学者的科学批判精神和逆向思维方式有着很深的感悟。

第二，学术研究的宽容精神。理论科学性的判断标准应是它的“真伪性、可反驳性和可检验性”（falsifiability, refutability, testability）。^③ 风靡一时的理论如果最后发现是错误的，则会失去它原有的灿烂和光环；可以不断变通并重新加以诠释的理论，则会让人感到弹性太大、左右逢源，因而缺乏可信度；对各种问题都可以论述而不可验证的理论则会变成宗教教义，必将丧失其科学的意义。正是为了回避这些现象，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学者中的大多数人在理论创新的同时也都做好了被证伪、被反驳和被检验的准备。这类例子俯拾即是：沃尔兹在他的《国际政治理论》出版前言中写道：“由于一种理论决不会是完满的，所以我过去一直不愿意宣告手稿已完成。而如今我宣告它的完成——不是带着已完成的感覺，而是带着长松一口气的寬慰，……。”^④ 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 Wendt）在他的《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前言中写道：“虽然国际关系不能还原为社会理论，但是国际关系的许多学理辩论涉及社会理论。所以我希望，即便是本书的论断受到质疑，国际关系的这些方面也会被比较清晰地显现出来。”^⑤ 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认为：“对于其（注：此书）意义和有用性的检验不在于看它是否说明了正发生于全球政治中的所有事情，它显然做不到这一点，而在于看它是否比其他任何可供选择的范式提供了一个更有意义的和更有用的观察国际发展的视角。此外，没有一个范式是永久有效的。”^⑥ 由此可见，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学者从提出

① Karl Popper, *Conjectures and Refutations: The Growth of Science and Knowledge*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Classics, 1963), p. 1.

② 恩格斯：《路易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4页。

③ Karl Popper, *Conjectures and Refutations: The Growth of Science and Knowledge*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Classics, 1963), p. 49.

④ [美] 肯尼思·沃尔兹：《国际政治理论》（胡少华、王红缨译），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序。

⑤ [美] 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致谢。

⑥ [美] 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前言，第2页。

他们理论的第一天起就做好了准备，有着宽广的胸怀，愿意接受来自各方的批评甚至批判，更愿意修正和完善自己的理论。

更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学术宽容”不仅包括被批评者的宽容，而且包括批评者的宽容。允纳批评、善待缺陷、反思不足是“学术宽容”的基本要素。许多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家在批评对方的同时，无时不在学习对方并检讨自己。新自由主义代表人物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Keohane）在批评新现实主义时承认了在合作背后存在权力的事实便是一例。

从1987年中国首次召开国际关系理论研讨会开始，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界虽然出现过学者之间在某一问题上的争论，但至今为止我国学术界没有形成，也承受不起这种科学猜想、反驳和批判的过程。而且，今天国际关系理论界的辩论在一定程度上更像是对自己所研究的西方理论的辩护，而不是对它的猜想和反驳。之所以会有这种现象，一是由于至今中国没有学者能提出和建立中国人自己的国际关系理论，所以无理论可反；二是由于中国人的以“和”为贵思想传统，使学者们之间展开学术上的交锋变得极为谨慎；三是我们的经历造成我们在猜想和反驳上变得慎之又慎。10年“文革”对优秀文化的狂批烂斗，科学上的无知和学术上的极“左”几乎使人们处于癫狂状态，“文革”的经历至今让人们对于带有批判色彩的论述心有余悸。

（二）理解与掌握不同的“看待世界的方式”

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每一步都是范式和方法论上的进步。在这里，进步并不意味着新的范式一定要取代或否定原有的范式，主要是在解释国际问题和观察国际问题时视角有了新的拓展。范式的概念由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提出。它是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进步的模式。库恩的范式概念至今不够清晰。根据它的基本特征，范式可以描述为：“首先，它们是一种‘看待世界的方式’，一种宽泛的准形而上学洞见或是关于某一领域的现象应该怎样予以说明的一种预期。涵盖在任何充分发展了的范式之伞之下的，是一系列具体理论，其中每一个理论都以此范式的一个或多个要素为其前提。一个范式一旦为科学家所接受，他们接下来的工作便是‘阐明范式’，这也是‘常规科学’时期。在‘常规科学’时期，占统治地位的范式本身被认为是不可改变的，并免遭批评。具体的单个理论可以予以批评、伪证和放弃，但范式本身却不受到挑战。如此一直保持到积累起来足够的‘反常’，使科学家对于这一主导范式是否合适发生怀

疑。……如果可供选择的范式之一与先前的范式相比证明在经验上更为成功，那就发生了科学革命，一个新的范式得以诞生，接下来便是另一个常规科学时期。”^① 简而言之，范式是对世界上同一事物的不同解释。

迄今为止，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界先后出现过4种范式，即现实主义范式、自由主义范式、革命主义范式和建构主义范式。在不同的“看待世界的方式”下，它们对国际关系现象做出了自己的解释和说明。早期的现实主义看到的是权力与斗争；后来的自由主义看到的是合作与依存；革命主义范式看到的是经济和政治的关系；建构主义看到的是共有知识和文化体系结构。这4种不同的“看待世界的方式”为国际关系研究者和实践者观察与分析国际问题提供了不同的视角和思路。而正是由于每一种范式都有其自身的科学性，学习和掌握它们便为人们更加透彻地观察和理解国家间关系提供了帮助。

此外，国际关系史的大多数时间段内并不是仅存在一种范式，而是几种范式同时并存，被不同的人所应用。虽然有学者强调范式之间不可通约，但并不意味着它们之间不可互补。对不同范式的了解使外交家和战略决策者在研究问题和解决问题时找到了更多的途径。今天同时用几种研究范式观察和解释国际关系已经成为决策者的明智选择。冷战结束后，美国政府处理国际关系的方式既有浓重的自由主义色彩，又有现实主义色彩，便是一个例证。克林顿政府在奉行自由主义理念的同时没有忘记现实主义在权力及利益上的告诫；小布什政府在推行现实主义政策的同时也在推行着自由主义的政策。因此，研究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意义既在于它们可以为我所用，扩大我们的决策思路，还在于有利于我们加深对西方外交政策的理解。

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发达不仅是范式的发达，更是方法论的发达。范式涉及到世界观的转变；方法论涉及的是如何发现事实的路径。在两者之间的关系上，库恩指出：“从现代编史学的眼界来审视过去的研究记录，科学史家可能会惊呼：范式一改变，这个世界本身也随之改变了。科学家由一个新范式指引，去采用新工具，注意新领域。甚至更为重要的是，在革命过程中科学家用熟悉的工具去注意以前注意过的地方时，他们会看到不同的东西。”

^① [美] 拉瑞·劳丹：《进步及其问题》（刘新民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年，第74页。

“革命之前科学家世界中的鸭子到革命之后就成了兔子。”^① 由此，我们说，范式属于世界观的范畴，方法论应是从属于范式之下的内容。有人认为，至今为止，在西方国际关系领域里发生过两次关于方法论上的争论。第一次是行为主义（the behavioural approach）和传统主义（the traditional approach）的争论，时间在 20 世纪 50 至 60 年代。^② 行为主义重视对事实的统计，传统主义重视对事实的说明；行为主义强调寻找事物的同一性，传统主义强调发现事物的个性；行为主义关注概念的抽象衡量特征，传统主义冥想概念的具体实在特性；行为主义运用的方法大多是数据的收集、整理、评估和模型的建立；传统主义运用的方法大多是哲学、历史和法律的规范。第一次方法论争论的结果没有分出胜负。

第二次是实证主义和后实证主义的争论，这场争论在冷战结束后开始，延续至今。实证主义的代表性理论是新现实主义。实证主义在某种意义上说是行为主义的遗产，它继承了行为主义的大多数假设和观点，只不过在论述问题时比行为主义更复杂一些。^③ 实证主义强调 5 个原则：第一，观察和试验是建立理论的基础；第二，知识脱离人的主观而客观存在；第三，国际关系中存在一定的行为模式和规则；第四，大多数人信奉理论价值中立原则；第五，变量选择的有限性和受控性。后实证主义具有代表性的理论包括批判理论、后现代主义和建构主义理论。概括起来，后实证主义有 3 个原则：第一，否认识识能脱离人的主观而客观存在；第二，否认理论的客观性，认为它们不过是知识分子的幻觉，是他们的信仰；第三，否认理论价值中立原则。

值得注意的是，与前面这两场方法论争论同时并存的是关于本体论（ontology）内部和认识论（epistemology）内部的争论。本体论研究的是世界的本源是什么，它所提出的问题是：现实世界是客观存在的，还是人们创造的？在本体论问题上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方法论：客观主义本体论和主观主义本体论。所谓客观主义本体论（objectivist ontology）认为，世界是离开人脑而存在的事物，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所谓主观主义本体论（subjecti-

① [美] 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年版，第 101 页。

② Robert Jackson and George Sorensen, *Introduction t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217.

③ Robert Jackson and George Sorensen, *Introduction t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228.

vist ontology) 认为,世界不过是用语言、概念和思想构成的人们头脑中所想象的事物,关键是在人们认识世界和国际关系的过程中如何组织这些事物。^① 认识论研究的是我们怎样才能以正确的路径去认识世界,即我们怎样认识国际关系。在认识论方面也可分为两大阵营:一是解释性认识论(explaining epistemology)阵营,它强调理论要建立在可信的经验假设基础之上并对世界加以解释,强调一种“认识”的路线;另一个是理解性认识论(understanding epistemology)阵营,它强调人类只有通过不断研究才能真正“理解”世界,认为世界只能用历史、法律和道德问题去理解,而不可能用自然科学的词汇加以解释。^② 因此,行为主义和实证主义学者一般都是解释性认识论者,传统主义学者大都则是理解性认识论者。如果我们以极端的方法,按照不同的本体论和认识论将不同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做一划分,可以得到以下图表:^③

本体论 认识论	主观主义本体论	客观主义本体论
解释性认识论	建构主义	新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
理解性认识论	理想主义、国际社会理论、 规范理论、后现代主义	传统现实主义、批判理论

总之,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最大特点是存在众多不同的看待国际关系的思维方式。它们之间的分歧不仅是世界观的分歧,还是方法论的分歧。这种分歧的多样性本身说明了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学者研究方法的丰富。一个领域内理论流派繁多的好处不仅是它可以催生思想的繁荣,更重要的是可以促进学科的发展。

① 参见 Robert Jackson and George Sorensen, *Introduction t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243.

② 参见 Robert Jackson and George Sorensen, *Introduction t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243.

③ 需要说明的是:第一,许多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在方法论上往往走中间路线,图表的划分只是为了更好地说明问题,许多理论具有多种特征,并非仅是绝对地选择一种方法。第二,至今为止,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纯粹的主观主义本体论还很少,有些理论在方法论上声称既是主观主义本体论,也是客观主义本体论,建构主义和规范主义都是如此。

(三) 学会提出新概念

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多样性的基础是概念。所谓概念比较可以接受的定义有两种：第一种含义是指一种构想。莫顿·卡普兰（Morton Kaplan）区分了科学研究中的3种事物：一种事物是人们可以直接观察到的东西，比如苹果的颜色；另一种事物是人们可以间接观察到的东西，比如历史书中所描绘的过去人类社会；还有一种事物是通过发明后才能观察到的东西，比如智商。卡普兰把概念定义为人们所创造的构想，概念即构想（concepts are constructs）。“概念（concepts）像感情和偏见，是由你所想象（conception）的它们、我所想象的它们和所有用这些词汇的人们的想象而创造后构建的。”^① 另一种含义则与理论问题有关，但事实上也是一种构想。“概念问题是这种或那种理论所显示出来的问题。它们是理论所特有的，不能独立于理论而存在，它们甚至不具有经验问题有时所具有的那种有限的自主性。如果说，经验问题是有关某一领域的实体的第一级问题，那么概念问题就是有关概念结构（例如：理论）的基础是否牢靠的更高一级的问题，因为，概念结构是人们构造出来用以回答第一级问题的。”^②

在国际关系理论中，所谓概念，实际上就是指那些为说明国际关系人们在建构理论时所想象出的词汇，它们是理论说明不可缺少的关键变量。具有关键变量性质的概念是核心概念，是理论的生命，也是理论研究的起点。核心概念就是理论的硬核。^③ 不同的理论对国际关系的观察视角和解释方式不同，所创造或选用的概念自然就不同，所反映的思想也就不同。不同的国家所面临的国际和国内问题不同，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 and 角色不同，所具有的文化传统和思维方式不同，它们需要解决和回答的问题也就不同，由此所选用的核心概念和在此基础上建立的理论体系自然就不会相同。黑格尔说过：“概念是自由的原则，是独立存在着的实体性的力量。……概念无疑是形式，但必须认为是无限的有创造性的形式，它包含一切充实的内容在自身内，并同时又不为内容所限制或束缚。同样，如果人们所了解的具体是指感觉中的具体事物或一般直接的可感知的东西来说，那么，概念也可以说是抽象的。”

① [美] 艾尔·巴比：《社会研究方法基础》，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24页。

② [美] 拉瑞·劳丹：《进步及其问题》（刘新民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第50—51页。

③ 关于理论硬核的提法参见秦亚青：《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问题与中国学派的生成》，载《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3期。

概念作为概念是不能用手去捉摸的，当我们在进行概念思维时，听觉和视觉必定已经成为过去了。可是如前面所说，概念同时仍然是真正的具体东西。这是因为概念是“存在”与“本质”的统一，而且包含这两个范围中全部丰富的内容在自身之内。”^① 列宁曾经摘录了黑格尔紧接着说的下面这句话：“概念的逻辑通常被认作仅是形式的科学，并被理解为研究概念、判断、推论的形式本身的科学，而完全不涉及内容方面是否有某种真的东西；殊不知关于某物是否是真理的问题完全取决于内容。如果概念的逻辑形式实际上是死的、无作用的和无差别的表象和思想的容器的话，那么关于这些形式的知识就会是与真理无涉的、无聊的古董。但事实上，与此相反，它们（逻辑形式）作为概念的形式乃是现实事物的活生生的精神。”^②

由此可见，提出科学的核心概念是理论创新的前提。摩根索现实主义理论提出的核心概念是权力和利益；沃尔兹新现实主义理论提出的核心概念是体系和结构；新自由主义理论提出的核心概念是相互依存和国际机制；英国学派理论提出的核心概念是国际社会和世界社会；建构主义理论提出的核心概念是文化和身份认同等等。与此相同，在其他学科领域内所出现的许多著名理论也大都是从核心概念出发，建立起其理论框架的，如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理论是从商品概念开始的，弗洛伊德的心理学的从性概念开始的，达尔文的进化论是从物种概念开始的等等。因此，中国国际关系学者实现自己建立国际关系理论的宏伟蓝图就要从找到核心概念做起，如何在纷纭复杂的各种现象中，从我们面临的国内外形势分析中找到能够解释和说明问题的核心变量，是我们实现“理论大志”的前提。至今为止，我们之所以还没有能够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体系，或称中国学派的国际关系理论体系与我们缺乏对概念重要性的认识及由此匮乏的创造灵感有一定的关系。

（四）辩证地看待与把握理论与决策之间的关系

美国学者克里斯多弗·黑尔（Christopher Hill）认为，在美国，“学者和政策实践者关系的重要性在 20 世纪稳步上升，这是由于社会和科学进步的步伐已经加快了政府行为多元化的原因。决策者需要吸取外界的知识源泉

① [德] 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年版，第 327—328 页。

② [德] 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年版，第 331 页。

和判断；而学者则经常希望在政策讨论中提供最好的建议。”^① 目前，在美国国际关系界存在着两套人马，他们既有联系也有区别。一套人马是与决策有关的机构和人士，即决策界；另一套人马是与国际关系研究相关的理论家和经济学家，即学术界。这两套人马不具有天然和牢固的联系，至今有关这两套人马之间关系的讨论仍在进行。然而，与中国相比，美国国际关系决策界与学术界的联系要密切得多，国际关系理论对决策的影响也要大得多。由此，我们需要阐述两个问题：

第一，美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着国际关系实践，理论与决策究竟有着怎样的关联？

“理论是对事物，这种事物不是指某一具体或某一种事物，而是指具有普遍意义的事物的假设性解释。”^② 理论是对复杂国际关系现象做出规律性解释说明的高度简约，这种说明的意义是它可以预测国际关系的发展，并据此提出对策性建议。行动是具体的，理论是抽象的。美国国际关系理论对外政策一直有着不可忽视的指导作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威尔逊提出的“十四点计划”是国联和联合国诞生的直接原因；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摩根索对权力的解释直接影响了杜鲁门政府对苏联扩张行为的看法和遏制政策的出笼；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基辛格在大学里学到的均势理论，在美、中、苏大三角关系的博弈中得到了充分应用；卡特政府的人权外交理论，则是以西方人权理论为基础的。冷战结束初期，“民主和平论”对克林顿政府决定在经济上积极援助俄罗斯曾起到过重要作用。在亚太安全政策上，克林顿政府受新自由主义的影响，重视的是亚太安全机制的建立。因此，在他任期内，美国对中国的压力不是军事和政治上等硬权力的压力，而是机制上等软权力的压力。受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影响的小布什政府上台后，有关建立亚太安全机制的讨论减少了许多，美国政府重新开始重视均势在亚太安全中的作用，更加重视美日同盟而不是亚太安全机制的建立。总之，随着国际关系理论影响在美国精英阶层的不断扩大，它们对外交实践的影响即便是间接的却不可忽视。

反过来，美国政府的外交实践也推动了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在威尔逊

^① Christopher Hill & Pamela Beshoff, *Two World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Academics, Practitioners and the Trade in Ideas* (London: An LSE Centenary Publication, 1994), p. 3.

^② Sara Tulloch, ed. *Complete Wordfinder* (Oxford, Reader's Digest Association Limited, 1990), p. 1620.

理想主义思想的影响下，国联建立；而国联的失败，促发了人们对理想主义的反思。二战中人性残暴一面的凸显和二战后美苏之间的争夺，导致摩根索现实主义权力理论的诞生；20世纪50年代欧洲煤钢合作的出现和欧洲各国合作的展开，美国在与欧洲国家磨合的同时受到很大启示，于是才会有基欧汉等人对相互依存现象的解释和阐发；冷战中两极体系的形成，促发了新现实主义理论的诞生；随着国家之间对话的增多和权力政治在国际关系解释上影响力的削弱，美国出现了建构主义理论，它从一种新的角度论述了文化对国际关系的重要意义。

因此，美国国际关系理论和实践之间的关系是一种互相影响和互相促进的关系，这种关系虽然并非显而易见，但自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提出理想主义理论时就已经开始。

第二，美国国际关系理论学者如何保持学术研究的独立性？

国际关系理论具有3个基本特征，即现实性特征、意识形态特征和实践性特征。所谓现实性特征指的是它不像历史学那样可以不关注当前激烈的国家间斗争和复杂的国家间关系；所谓意识形态特征指的是它不像心理学等理论那样可以不具有明显的价值取向；所谓实践性特征指的是它必须应用到实践中去检验，而不像哲学理论可以高高在上地宏观和抽象地论述一番问题。简言之，它很难与现实相脱离，很难与意识形态相脱离，更很难与具体实践相脱离。这3个特征要求国际关系理论家必须从本国的立场出发对现实的国际关系做出指导或实践上的说明。同时，也正是由于这3个基本特征的存在，使国际关系学界的学者比其他任何学科领域的学者都更难保持学术的独立性和学者的独立人格。因此，在国际关系学术界保持学术独立和学者人格独立，比在其他任何学术领域都更难能可贵。对一个国家来说，如果学术界变成政界的附和，学术研究存在的意义将会丧失，政界外交实践将会仿佛凭着感觉走路。从以“以学术为业”变为“以政治为业”并非不可行，^①但如学术堕落为政治的随从，学术的价值便将丧失。

根据美国学者克里斯多弗·黑尔和帕米拉·巴施弗（Pamela Beshoff）等人的研究，美国国际关系研究人员的分类可按照6：3：1的比例划分。6成的人在进行现实问题研究；1成的人在进行纯理论研究；3成的人属于两

^① 马克斯·韦伯认为，以政治为业的人需要三个前提性的素质：激情、责任感和恰如其分的判断力。参见〔德〕马克斯·韦伯：《学术与政治》（冯克斯译），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00页。

栖人员，既研究现实，也研究理论。^① 美国占 6 成的国际关系研究人员主要是为政府决策服务，他们或是属于职能部门或是属于思想库。因此，这些人在思想上很难保持独立人格，他们所写的研究报告不得不考虑政府的好恶。对这些人来说，参与现实决策并最终得到承认是走向仕途的捷径，国际关系研究的鲜明现实性特征也很难让能人轻易摆脱“仕途”的吸引，参与决策是许多国际政治研究人员的最终目标。那些只占 1 成的、极少数的纯理论研究者大多数在大学里工作，典型的代表人物有：汉斯·摩根索、肯尼思·沃尔兹、罗伯特·基欧汉和亚历山大·温特等。他们有两个共同点：一是他们所研究的理论有着很强的为国家利益服务的目的性；二是他们基本上不参与任何政府的决策活动但却无时无刻不在冷眼旁观着美国政府决策的结果，一生超脱地享受着独立思考、研究和内心宁静的快乐。摩根索指出：“知识分子所生活的世界与政治家所生活的世界是既相互分裂又潜在地相互纠缠的世界。这两个世界是互相分裂的，因为它们倾向于不同的价值观。……真理威胁着权力；权力也威胁着真理。”“知识分子可以选择服务、对抗或者蔑视政府——所有这些都是必要的角色——但要做成任何有价值的事情，他必须对外界的压力有免疫力……。”^② 在美国，正是由于有这 1 成人的存在才使得美国战略决策和外交制定有持续不断地思想支撑。从表面上看，外交实践涉及的是现实应对问题；理论研究则有可能关注几个世纪以前的事情；理论与实践之间看似相距千里，然而，正是由于美国国际关系理论界有着这样一批优秀的、具有独立学术人格的学者的存在，美国政府的现实决策才愈加离不开国际关系理论的指引，美国国际关系理论与现实决策的紧密、隐性结合才变得如此自然。至今为止，当代美国国际关系理论“大家”和对美国外交实践贡献最大的人几乎都是能够保持学术独立的学者。半个多世纪以来，他们突出的学术成就不仅影响了美国外交家的思想和实践，甚至还影响了世界的外交思维方式。

在上述三种人中，决策研究的人可以不懂理论，甚至可以说理论无用；纯理论研究的人可以暂时忘掉现实，“为学术而学术”；中间的两栖学者则是

① 参见：Christopher Hill & Pamela Beshoff, *Two World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Academics, Practitioners and the Trade in Ideas* (London: An LSE Centenary Publication, 1994).

② Hans Morgenthau, *Truth and Power: Essays of a Decade, 1960-1970* (London, Pall Mall Press, 1970), p. 14.

既懂得理论又知道现实的人，但他们往往却是成就最小和^①感觉最痛苦的一群人。因为，在美国国际关系研究群体中占3成的这部分两栖型学者是这样行事的：他们原本希望自己在理论上有所建树，而每日急需解决的现实问题又常会使他们不知不觉地将兴趣点转移，开始研究现实对策。而一旦当他们发现自己解决现实的能力有限之后，他们又希望回到深邃的理论中去寻找答案。然而，理论研究的艰辛、冷寂和漫长的特点又会使这些人按捺不住对解决现实问题的焦虑，甚至功利心的诱惑。最后，他们再次忘掉理论，试图去寻找简单快捷的路径。当然，这个群体中的一些人在理论和现实研究方面已取得了较大的成就，但与前两种人在各自领域中的成就相比，他们两线作战的成果总不如在一个领域中的成果巨大。

一

英国国际关系理论和美国国际关系理论都属于当代西方国际关系主流理论。美英两国在文化上同源。不同于中国文化，它们在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和价值观上都延续了西方文明。在有关本体和现象（即客体）关系的问题上，西方哲学都是把本体和现象（即客体）割裂开来加以讨论，而不像中国哲学那样，认为“体用一原，即现象见本体，本体亦现象”。^②在有关本体的性质问题上，即唯物还是唯心问题上，西方哲学明确分为3派：唯物主义、唯心主义和两者平行的二元论。而传统中国的哲学家在这个问题上持“一体二元”的观点，“即在统一的世界本体中包含着相反相承两个方面，即两个并列的、相反的本原”。^③在认识论问题上，一般来说，认识论主要讨论两种认识：主体对外在的认识和主体对内在的认识，即对自身的认识。西方文化大都重视研究主体对外在的认识，强调主体与客体的对立，关心的是怎样获得外界知识的问题。相比之下，东方认识论则更重视反省自身的身

① 美国学者克里斯多弗·黑尔认为，介乎于学术和实践两个世界的人是比较痛苦的，但赫德利·布尔是比较成功的人，他在双方都受到尊重。参见 Christopher Hill, "Academic International Relations-The Siren Song of Policy Relevance," Christopher Hill & Pamela Beshoff (London: An LSE Centenary Publication, 1994), p. 3.

② 焦树安：《比较哲学》，北京·中国文化书院，1987年版，第126页。

③ 焦树安：《比较哲学》，北京·中国文化书院，1987年版，第127页。